

---

# 地域人文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 一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引领意义

王嘉良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取决于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也根因于积淀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对现实主义的精神呼应。其引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都有显著表征,集中体现在对各种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浙江潮”; 地域人文传统; 现实主义; 引领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0)02-0001-07

20世纪初崛起的以鲁迅领衔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是以许多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构成一种“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为世所重的。<sup>①</sup>这个作家群体对于建构中国新文学有着诸多独特创造,尤其在引领文学新潮方面更引人瞩目。本文集中论其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引领意义,便是以区域文化精神作为切入口,探讨这个“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新文学群体在文学思潮领域的创造性贡献。

### 一、启蒙意识自觉:两浙人文传统启引浙军的文学新潮探寻

启蒙文化思潮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推助力。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以启蒙意识的自觉焕发出以启蒙为导向建构新文学思潮体系的坚执精神,以及以开放性的眼光汲取世界文艺新潮,显然以浙江作家群为甚。他们一登上“五四”文坛,便目光四射,在多种文学领域里探寻,遂有新文学建设的广泛建树,才使“浙江潮”的整体涌动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此,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浙江作家以首创者的姿态开拓新路,并非仅仅只是基于一种实践的精神、探索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他们对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因而总是能够挺立潮头,引领文学潮流。在“五四”新文学建设期,浙江作家以广纳博取的精神汲取世界文学新潮,担纲组建各种新文学社团,开始了体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种文学思潮的理论探寻,为中国新文学指示了未来发展的前景。这当中,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文学大师,周作人、沈雁冰领衔文学研究会及标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旗帜,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中坚开创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徐志摩担纲新月社并开始唯美主义文学创作等,都显现出卓然特立的姿态,显示出他们以首创者的姿态在文学领域里显示了开拓新路的潜能。此种潜能,在新文学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承续与张扬,“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潮的态势也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向。这里值得深究的是:在一个独特地域涌出的作家群体,何以会有如此自觉的文学思潮探索意识,因而总是能够引领潮流之先?

---

收稿日期: 2009-12-30

作者简介: 王嘉良(1942-),男,浙江上虞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与20世纪中国文学”(05BZW 043)

就一般意义而言,我国新兴文学思潮的形成,有“外援”与“内源”两重因素。如果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对“外援”即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与接受是一种共性,那么,一个地区作家的思潮接受意识表现特别强烈,其更多体现了地域作家群体个性的“内源”性因素就更值得重视。“内源”性自觉,是呼应外来思潮的前提,正因为“五四”新文学精神内核中的确潜藏着一种自觉性的变革因素,才使外来思潮的接受成为可能,任何一种外来思潮的传入并被接纳,如果没有“内源”性的策应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sup>②</sup>就此而言,“传统内”的变革因素对于呼应外来思潮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启蒙意识的自觉来自“小传统”地域的浙江作家为甚,这恰恰体现了这个地域文化传统积累之深,浙江新文学作家引领潮流之先,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取决于“小传统”地域潜在的文化基因。这一地域自宋、明以来,文化思想十分活跃,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思潮,高举变革的旗帜,与墨守成规的“大传统”文化构成尖锐的对立,同样显出与传统的“惊人的决裂”。而且,“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在我国宋明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主导地位”,<sup>③</sup>甚至可以说它长时期处于中国文化的制高点上。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传统内的变化”的出现,且其一度引领文化思潮,对后来我国文化的整体变革是极重要的。20世纪初崛起的新一代浙江学人曾发出如此感叹:“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其此言乎”,<sup>④</sup>便包含有浙人的自豪感和承担责任的紧迫使命感。此种感受,并非盲目乐观,也非徒作空言。事实上,这个“文明之中心点”,是历史所造就的,已为人们所广泛认知。杜维运引证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之说后,对其发展历程做出了精当阐述。他指出:“永嘉之周行己、郑伯雄,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创浙东金华、永嘉两派之史学”,“元明之世,浙东史家虽趋衰微,而其统不绝”,“至清初黄宗羲出,则骤成中兴之新局面”,所以,“数百年间,师教乡风,前后相维,若脉可寻”。<sup>⑤</sup>他谈的是“浙东史学”,没有涉及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浙东心学思潮,若将其也涵括在内,则浙东文化学术思想之“前后相维”,更清晰可见。对于浙东的“文化中心”地位,也早有历史定评。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认为,明清时期“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学术繁盛,是“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特别是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文化思想的引领地位,并一直对后世尤其是近代产生深刻的影响:“最近三十年思想界的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的复活。”<sup>⑥</sup>他所说的“最近三十年”,正是近现代文化思想转型时期,正可以说明:出于“传统内”的先进文化思潮也是促成文化思想向着现代转型的“原动力”之一。

由上述可见,20世纪初先进文化/文学思潮的形成,外来思潮的影响不能低估,但传统积淀的因素依然不可忽视。两浙文化传统的熏染,总是使得浙江学人在审视文化、文学思潮时怀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承续传统中开阔其推进文学新潮的思路。《浙江潮》同人追踪“乡先贤”以“文明之中心点”自策自励是一例,另一个典型例证是周作人在探索中国新文学源头时将其追溯到晚明。其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就认为“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是“明末的新文学运动”的重演,举证便有浙籍启蒙文学先驱,甚至认为其绍兴同乡张岱“集公安、竟陵两派之大成”,对推动明末文学潮流贡献最大。<sup>⑦</sup>以这样的思路去看取文学新潮,遂有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两浙作家群承续先贤发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呐喊,也才有他们自觉呼应、接纳外来先进文学思潮推进新文学的发展。质言之,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融合世界文学新潮,又有效地承传“传统内”的变革思潮,体现出“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中推动新潮,这才有浙江作家在新文学思潮建构方面卓然独步的辉煌,也形成他们建构新文学思潮体系的显著特色。

## 二、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引领

文学思潮包含广泛的内容,浙江新文学作家对文学思潮的选择也各有不同,但最重要的文学思潮不外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对这三种文学思潮的传播与张扬,浙江新文学作家多有建树,而且大多居于领衔者的地位。“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潮的经验,同样值得汲取与借鉴。

就对中国新文学施加重大影响的文学思潮而言,最先以世界先进文学思潮叩开中国文学现代化大门的,无疑是现实主义。19、20世纪之交中国新文学在其孕育过程中寻求着现代性转机,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现实主义是被率先引进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最早提出“写实派”和“浪漫派”,并介绍说写实派乃是“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感人深,莫此为甚”。这里的“写实派”已有了现实主义的

---

某些特征,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思潮意义的最先传人。可惜梁氏垂青于政治小说,“写实派”在当时并未引起讨论,创作的成果就被淹没在近代启蒙思潮中。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潮流的选择与吸纳,并使之在新文学建构中产生重要作用,还需要新文学者做出极大的努力。

探究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大潮的形成,挺立在这股潮头的就有“浙江潮”的弄潮儿,而且正是他们的热情鼓吹,倾力提倡,遂有其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无可漠视的引领地位。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引进、倡导,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从一开始便给予了极大关注,其中通过对西方文艺思潮的系统介绍推崇现实主义的是陈独秀和沈雁冰。他们不约而同描述过文学思潮的走向应是循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路行进的轨迹,认为20世纪中国最需要接受的是现实主义文学。<sup>⑤</sup>而沈雁冰(茅盾)对现实主义的选择,更显出坚定、执着的姿态。这并非是一种随意性的选择,恰恰是其对各种文学思潮经过反复比较,筛选以后做出的抉择,其抉择的依据正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时代适应性。正如其后来所表述的:“‘五四’以来短短的文艺已经从事实上证明,有以浪漫主义出发的,有以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出发的,甚至也有以不知是什么主义出发的,但时代的客观的需要是写实主义,所以写实文学成了主潮。”<sup>⑥</sup>另两个浙籍新文学先驱鲁迅和周作人都对新文学的“思想革命”特质作过精当阐述,他们基于新文学革命最初是从“思想革命”角度切入,目的是在用文学实现思想启蒙,启发人的自觉,投入争取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现实关注,现实主义便成为一种最可取的选择。正如当年周作人在谈到文艺思潮选择时所指出的:“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sup>⑦</sup>

浙江新文学作家何以如此厚爱于现实主义?大而言之,当然与他们以开阔的胸襟接受世界文艺新潮不无关系;但若是就独特性而言,这依然关联着文学传统的延续性和地域文化精神的承传性。传统现实主义研究以及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研究往往过于注重中国新文学在走向现代途程中的创伤性(trumatic)经验,相对忽视对中国文学自身积累的经验 and 传统内部新质储备的探寻。事实上,后者恰恰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浙江新文学作家引领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是现实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及中国作家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契合。作为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是在中国新文学中显出强大声势的,但作为创作方法,写实主义却一直在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用写实的方法进行创作,在创作中体现了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也可说是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结构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并存,而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传统士人历来就有参与现实的精神,所谓“修、齐、治、平”乃是读书人的伦理规范。由此也便有了文学参与社会、参与现实的传统。我国的现代作家(特别是第一代作家)固然大都眼光向外,勇于接受世界文学新潮,但他们除了精通“西学”外,同样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上文阐述过传统文化对浙江新一代学人的滋养已不难看出。由于对传统文学精神的承传已不自觉地内化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涉及文学思潮的择取,他们秉承前人遗教,重在现实主义一头,便是势所必然。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五四运动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立场崩溃了,便对新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需求,20世纪的文化演进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文化秩序和精神支柱的过程,所以新文学作家大抵有着开放的文化心态去吸收各种新思想。而中国是带着浓重的忧患情绪进入20世纪的,忧患情绪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天然底色,<sup>⑧</sup>因而注重“入世”精神的现实主义思潮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必然性选择。

其次是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新文学的“新质”滋生固然得益于外来文化思潮的滋养,但中国文学在近现代化过程中逐步累积的“新质”储备因素也不可忽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亦然:除了中国文学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做出的自我调整以外,还有就是作为与“大传统”对立的“小传统”提供的精神养分,即作为“小传统”地域的浙江区域文化场恰恰提供了一种新陈代谢的新质储备机制并将自身也纳入了“新质”的范畴。两浙文化传统养成了务实的现代精神,使这个区域文化场域当然具备传统所具有的适宜现实主义生长的条件,同时还存在着“大传统”所不具备的现实主义生长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两浙文化传统内蕴的现实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两浙史学精神和浙东理学对“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梁启超特别推崇浙东学术,就在于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即使他们的理想一时难以实现,也“宁可把理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拖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sup>⑨</sup>这一概括极为精到,也点出了浙东

学术独特的价值所在。浙东先贤王阳明就秉持“五经亦史”、“随时变易”的文化史观,阐明事与道、史与经的统一关系,对儒家经典以有力的挑战;清代章学诚更提出叛逆性的“六经皆史”的命题,试图打破千百年来的“尊经”传统。<sup>⑧</sup>对“史”的强调与尊崇,其内隐的是越地文人的崇实精神,昭示出他们与现实主义审美规范的一致性,而对“史”和“实”的重视,恰恰符合现实主义精神,显示出浙江学人对现实主义的体认就具有了外显和内隐双重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浙东理学鼓吹的经世致用思想,还直接呼应着时代社会的变革。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浙江地区重商言“利”之风日炽。朱舜水力倡“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sup>⑨</sup>黄宗羲也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sup>⑩</sup>“工商皆本”务实思想的提出是经世致用思想的集体演练,它完全不同于中原腹地的“农本”思想,显出了“小传统”地域人们思想的开阔性和务实精神的进一步张扬。于是就有近人章太炎的大声疾呼:“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烦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sup>⑪</sup>其对文学的“经世”功用就有了更深切的体认。“经世”是与“治国”相对应的,对文学来说,经世致用就是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要求。文学的功利性内涵已经被现代人所置换,更多地承担的是社会救亡的功能。这些传统积淀的因素,为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接受创造了先机,浙籍作家自然更得风气之先,其引领潮头也是势所必至。

### 三、浙军对文学思潮的关注点:重要现实主义形态的引领意义

关于浙江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兴奋点与关注点及其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开拓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可以从多种视角做出阐述,因为现实主义有多种表现形态,各种形态的表现视角、价值取向都各不相同,笼而统之的叙述很难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sup>⑫</sup>我们这里从形态论角度切入,探究由浙江作家鲁迅、周作人、茅盾领衔的三种主要现实主义形态,即思想启蒙型、人道关怀型、社会批判型,论定其独特的成就与贡献。这三种形态恰恰反映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因此从这一角度切入,也可以昭示出浙江作家在整个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进程中持续不断地把握现实主义的思潮特色。我们的研究自然也要从区域文化场域的角度探讨浙江独特的区域文化对现实主义的体认,从中概括出地域文学对整体文学的推动意义。

中国近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特色之一是“革弊启蒙,务实重用”,<sup>⑬</sup>思想启蒙是主潮,其中有现实主义的传入,但没有到形成思潮意义的高度。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才有过一次启蒙思潮与现实主义联姻的精彩出演,出现了初具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形态。这当中,从浙江走出的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无疑是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启蒙现实主义作家。考察鲁迅选择现实主义的动因及其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核心,不难看出其所主张所遵循的现实主义紧紧联系着思想启蒙要求,而其创作所提供的则是典型的启蒙现实主义范式。鲁迅谈到自己是在“启蒙主义”的驱动下开始小说创作,这可以看做是他选择此类现实主义的直接动因;而这种启蒙意识的形成,恰恰是其长期思想累积的结果,其中包括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就中国的启蒙文化思潮的“源头”而言,可以推衍到16世纪明中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特别是作为“小传统”地域的浙江可谓得风气之先。“浙东学派”的理论鼓吹,已见出鲜明的启蒙精神;至晚清,浙人先贤开始了更完善的启蒙工程的建构,龚自珍是当之无愧的代表,“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sup>⑭</sup>可见其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之大。后来者如章太炎对龚氏思想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推崇,清晰可见浙江地域启蒙思潮的香火不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遂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浙江新文学作家,接过先贤的启蒙之棒,进行不懈的启蒙思潮探索。早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鲁迅就把思想革命的重点放在“立人”上,其弃医从文的动机也在于意识到改变国民精神是“第一要著”,可见其选择、确立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是基于自觉的思想启蒙要求,因而对于启蒙现实主义文学在理论阐发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所重。其运用的两种主要文学样式小说和杂文,早在“五四文学”初期就已先声夺人,令其他作家望尘莫及,且其创作都抱有明确的思想启蒙目的,作品的启蒙意义尤为显豁。正如其自述:小说要描绘出“现在的我们国人的魂灵”;谈到杂文创作时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sup>⑮</sup>可见这两种文体正是其表达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载体。将改造国民性思想融化在创作中,于是就有典型的启蒙文学的产生;而由于鲁迅的在创作上的重重投入,也无形中浓化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氛围,提升了整个启蒙现实主义文学群体的创作品位。

在各种现实主义文学形态中,人道现实主义也是重要的一种。人道主义特别能够同现实主义联姻,是取决于这两种思潮在精

精神上的趋同性:人道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对人的完整性关心”,“在伟大的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sup>⑨</sup>中国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最重要的硕果,是“人的文学”的建构,而谈及这一文学理念的建构,不能不提到浙江作家周作人的贡献。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做出如是解释:“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强调人道主义是新文学之本;该文还第一次阐明了“人是文学的描写中心”,要求作家用“严肃、真挚”的态度,忠实地“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这是从现实主义层面上给出的意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已明显见出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雏形。“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将“人”的意识确定在人道主义理论范畴内考察,又用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主义形式表达,使中国新文学与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真正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系;这一文学形态注重文学内容和性质的更新,体现出新文学文本意识和结构系统的日渐成型,它已从只重思想启蒙的“启蒙文学”向着具有实质内涵的“人道文学”转化,标示着中国新文学真正的“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应当指出,周作人对人性、人道的推崇,其深层意识中有越文化场域较早的“人的意识”自觉的内源性体认与策应。越文化场域内蕴藏着丰富的人道因子,早在晚明时代就引发过对“人”的思考,周作人也多次提到晚明的“人学”思潮,甚至一度将其看成是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这种思考的持续发展,一旦遇合在新文化大潮中,就会凸显出来,五四前后,现实主义和人道思潮的译介达到高潮,周作人正是最早较为系统引进、介绍西方理论的作家。其译著表现出一个鲜明的倾向,便是同情于“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关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的作品,看重的是这些作家和作品“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sup>⑩</sup>这显然同其现实主义的选择视角有关。此后,他继续在这一命题上探求,形成了其完整的人道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人的文学》构筑了“人性论——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一体二翼思想模式,即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提倡合理的人性,发展人的个性,建设“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则提出作家应面向平民,记载“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创做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人生艺术派文学,这是对“人的文学”具体内涵的深层揭示,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识的深化。周作人对于现实主义的贡献就在于:不仅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对现实主义理论做出较为系统、全面的阐释,还在于以其丰赡的文学思想对于建构人道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有着别的作家无可取代的地位。

批判现实主义曾被称之为欧洲“正宗”现实主义,它在19世纪的欧洲“悄悄”兴起,并迅速风靡世界,且仍为20世纪作家所推崇,就在于其蕴涵极强的批判性向社会参与功能。如果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找到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作家,恐怕最容易想到的便是浙江作家茅盾。茅盾在文学理论上信守现实主义是人所共知的,其创作也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范式。普实克认为茅盾“所用的是欧洲正宗的现实主义方法”,<sup>⑪</sup>追溯茅盾的文学理论接受源及其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消化过程,大体上可以看出其吸纳世界文学新潮逐渐走向同欧洲“正宗”现实主义的认同。他最初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集中在丹纳等的实证美学,和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研磨上,由此显示出其汲取文学新潮,侧重点是在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性一面。其创作所显示的鲜明的社会批判和理性批判精神,体现了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的特长与优势,也展示了这位富有才情的作家独具的气度与胆魄。他初涉创作就有不俗气魄,一出手便是长篇小说,且震撼文坛。从1927年到1949年,他写了8部长篇,5部中篇,50多个短篇,叙写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创作堪称为一部现代中国社会编年史,显示出社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显著特点。

探究茅盾对现实主义的独特选择,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因素也不可忽视。茅盾的创作具有丰富的文化涵量,其创作的乡镇、小县城背景往往渲染出杭嘉湖水乡的浓重氛围,吴越文化造就的人格、气质,乃至提供的环境、背景,都是鲜明昭著的。然而对于茅盾来说,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又总是使他的创作紧紧联系着时代与社会的脉动,这更关联着他对于地域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吸纳。青少年时期的茅盾聪慧好学,他日后之成为一个博古通今的大家,特别是对古代文化/文学典籍能作纵横捭阖的评述,实在是从小打下的底子。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文化,其核心内容是经世致用,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无疑对茅盾成年以后形成积极“入世”的文学观和文化观,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另一层因素是维新文化思潮的直接影响。就近代中国维新文化思潮的流布看,浙江地域无疑是维新文化氛围最浓重的省份之一。甲午前后,当维新思潮在全国蔓延时,浙江便涌现一大批维

---

新人士,他们上承黄宗羲、龚自珍等浙籍文化先驱的遗绪,又回应全国维新运动,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方面曾做出过有声有色的表演。个中翘楚者,便有汤震、汪康年、章太炎、张元济等人,他们大都是茅盾的同乡杭嘉湖地区人。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之中,又置身在一个充溢着“维新”的文化氛围里,青年茅盾便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地域人文传统中获得新的文化滋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文化,与中西交融中形成的维新文化,因其有很强的渗透力,而且它始终与亟待改造的中国社会现实与社会思潮相契合,所以很容易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将其同近现代文化思潮融合,产生出积极的思想文化效应。20世纪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一路领先,内中就蕴涵着中国新文学作家积极入世精神的张扬。茅盾便是彰显此种精神的突出代表。

#### 注释:

①参见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载《浙江潮》第1期。

②参见谢冕《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序·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③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④参见《文史通义·与史余村》。

⑤关于从现实主义形态论角度切入的可取性研究视角及对各种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分类,笔者所著《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一书,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⑥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参考文献:

① 严家炎.总序[M]//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②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

③ 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④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164-165.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⑥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M].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4:57.

⑦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J].青年杂志,1915,1(3).

⑧ 茅盾.浪漫的与写实的[J].文艺阵地,1938,1(2).

⑨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J].小说月报,1921,12(号外).

- 
- ⑩ 滕复,等.浙江文化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348.
- ⑪ 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1.
- ⑫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03.
- ⑬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1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300.
- ⑭ 周作人.《空大鼓》序[M]//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上海:天马书店,1934:67-68.
- ⑮ 李岫.茅盾研究在国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36.